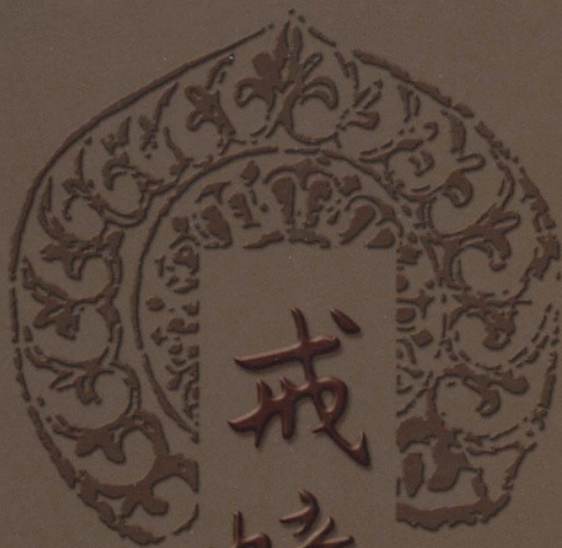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戒煙文集

【第四卷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济群
主编

戒煙文集

PDG



戒煙文集

济群主编

【第四卷】

B94-53
J145-3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戒幢文集

(全四册)

济群 主编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960 1/16 印张80 插页8 字数1,000千字

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4,000

ISBN 978-7-5325-5449-2

B·676

定价: 150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 T:0512-66700301



名誉主编 普 仁

主编 济 群

编委 净 智 恒 强 成 峰 界 文

寂 照 慈 云 宗 慧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戒幢文集·四 / 济群主编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9.11
(戒幢文集)

ISBN 978-7-5325-5449-2

I. 戒... II. 济... III. 佛教—文集 IV. B94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9484号

责任编辑: 李明权

目 录

宗 舜、文正义：略论禅宗与念佛.....	01
楼晓尉：汉传佛教安居双轨制建构的研究.....	45
德 澄：净土宗判教思想及其特色.....	102
海 慧：略论中观应成派对唯识学三自性思想的批判.....	153
廖乐根：略述唯识学的思想源流与发展演变.....	183
宗 净：六祖禅与《阿含经》中的上座禅.....	193
来 圣：窥基《金刚般若经赞述》与吉藏《金刚般若疏》的主要差异.....	212
净 智：《大乘大义章》浅析.....	233
宗 志：《金刚经》的修学体系浅探.....	250
恒 强：《阿含经》中的病缘增上解脱.....	259
成 峰：《净土十疑论》之第七疑考释.....	267
界 文：“游天住”的真意.....	273
宗 净：从律典看吸烟问题.....	278
恒 强：信心道念的退失与升进.....	285
净 智：论忍辱波罗蜜的修学.....	297

略论禅宗与念佛

——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

宗舜 文正义

内容提要：本文以中国禅宗四祖至六祖的禅学思想为中心，分“引言”、“东山法门”、“南能北秀”、“禅净融汇”四个部分，阐述了禅宗的主要禅法特点，以及对待念佛这一修行方式的态度，探讨了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
关键词：禅 禅宗 念佛 净土 净土宗

引 言

半个世纪前，太虚大师讲过：“中国佛学特质在禅。”^[1]禅在中国佛教中，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。但是，禅修与念佛一样，同为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，乃各宗各派所奉行，并非为禅宗所独有。禅宗之所以能够开宗立派，而又以“禅”名宗，固是以禅作为彻见心性的根本途径。可是，如果与其它佛教宗派的禅修，在目的、方法以至传承上，没有自身特别之

[1]案：1943年，太虚大师曾在汉藏教理院作过题名《中国佛学特质在禅》的学术报告。除《太虚大师全书》收录外，还见于张曼涛主编之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第二册《禅学论文集》（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）。

处，那就泯灭了宗门面目。禅宗的念佛，比之它宗的念佛，也不是时事事相符合。在禅宗的历史上，修禅与念佛，其内容并非一成不变，其关系也不是唇齿相依。

在佛教中，戒、定、慧称为三学，是僧伽修行的纲要。《楞严经》说：“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”^[1]“定”就是禅。“定”是中国固有的语词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定，安也。”^[2]可知“定”的原义为安定，引申有宁静、停息的意思。梵文Samādhi，音译为三昧或三摩提、三摩地，意译则为正定、等持。音、意两种译法，在佛经中都存在。禅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禅，祭天也。”^[3]“祭天”是禅的本义，读shan（善音，去声）。后来在翻译佛经Dhyānā时被借用，变读can（惭音，阳平）。《玉篇》“示部”说：“禅，静也。”^[4]禅是Dhyānā的译音“禅那”的略称，意译则为静虑。在中国，二者常相并称为“禅定”。^[5]唐·宗密《禅源诸论集都序》说：“禅是天竺之语，具云禅那，中华翻为思惟修，亦名静虑，皆定慧之通称也。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心地。悟之名慧，修之名定，定慧通称为禅那。”^[6]

佛教传入中国，禅学便与之俱来。早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，由安世高、支谶、竺法护、鸠摩罗什、佛驮跋陀罗及昙摩密多等人，译出了众多种类的禅经。他们所介绍的，大都以小乘禅法为主，如《安般守意经》、《修行道地经》、《坐禅三昧经》及《达摩多罗禅经》等。同时，大乘禅

[1]《楞严经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，第19册，第131页下。

[2]《说文解字》卷七下，中华书局1963年景印清·陈昌治刻本第150页下。

[3]《说文解字》卷一上，第9页上。

[4]《玉篇》卷第一“示部第三”，第5页上，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印行《小学名著六种》（景印《四部备要》本）。

[5] 隋·慧远《大乘义章》卷十三“八禅定义”之“释名辨性一”云：“第一释名，辨其体性。先辨其名，名别不同，略有七种：一名为禅，二名为定，三名三昧，四名正受，五名三摩提，六名奢摩他，七名解脱，亦名背捨。禅者，是是中国之言，此翻名为思惟修，亦云功德丛林。”又：“问曰：‘此等所名之法为一为异？’‘释有通、别。通而论之，一切禅定皆具此名。于个别分，经论不等。’”《大正藏》，第44册，第718页上。

[6]《禅源诸论集都序》卷上之一，《大正藏》，第48册，第399页上。

法也被介绍了过来，如《般舟三昧经》、《观无量寿经》、《首楞严三昧经》等。约在公元4世纪与5世纪间，修禅的种种法门已经逐渐地在中国流传开来。^[1]唐·宗密《禅源诸论集都序》卷上之一说：“达摩未到，古来诸家所解，皆是前四禅八定。”^[2]“四禅八定”是色界天的四禅和无色界天的四无色定的合称，在印度原来属于外道所修，佛陀吸取后进行了改造。这种禅法仍属小乘禅的体系，不能导致究竟解脱。当时所流行的禅法，也不全如宗密所论，“皆是前四禅八定”，也还流行着数息观、五门禅之类的小乘禅法。南朝梁·慧皎《高僧传》的“习禅”篇，所载僧传二十一人，^[3]作者在篇末《赞》里说：“五门弃恶，九次丛林。”^[4]便是一个证明。

禅宗所修习的禅定属于大乘禅。小乘禅与大乘禅有什么不同？宗密《禅源诸论集都序》卷上一说：

又真性则不垢不净，凡圣无差；禅则有浅有深，阶级殊等。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，是外道禅。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，是凡夫禅。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禅。悟我、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禅（上四类，皆有四色四空之异也）。若顿悟自心本来清静，元无烦恼，无漏智性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毕竟无异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禅，亦名如来清静禅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。此是一切三昧根本。若能念念修习，自然渐得百千三昧。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，是此禅也。^[5]

[1] 据梁·慧皎《高僧传》卷十一的“习禅”篇，其第一人为竺僧显，本姓傅氏，两晋间人。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395页中。

[2] 《大正藏》，第48册，第399中。

[3] 梁·慧皎《高僧传》“序录”卷十四云：“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（67），终至梁天监十八年（519），凡四百五十三载，二百五十七人，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。”其时菩提达摩已来中国，其书未能收录。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418页下。

[4] 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400页下。所谓“五门”，即是小乘七方便中所说之“五停心观”，指不净观、慈悲观、因缘观、界分别观、数息观。所谓“九次”，即是指次第无间所修的九种禅定。又称“无间禅”或“炼禅”，即色界的四禅定（初禅次第定、二禅次第定、三禅次第定、四禅次第定）、无色界的四处（虚空处次第定、识处次第定、无所有处次第定、非想非非想处次第定）以及灭受想次第定。

[5] 《大正藏》，第48册，第399页中。

禅宗的禅法是“最上乘禅”，当然就与所谓外道禅、凡夫禅的浅深、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了。禅宗的禅法的特点，被后人概括地总结为：离言说相，不著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

菩提达摩怀着“传教救迷情”^[1]的目的而来中土，虽被后世奉为中国禅宗初祖，而毕其一生，都未能走出屯蹇之境，其禅法也未得弘化开来。至于他的生平，包括出身、经历乃至生卒，都充满了神秘和疑团。根据历史文献综合，我们大致地知道，达摩是在南朝宋时，泛海来到中国，比之佛教之东传，已经晚了约四百年。后来北至北魏嵩、洛一带，弘传大乘“二入四行”禅法，不为时流所见重，曾入少林寺安心壁观。达摩行头陀行，居无定址，“游化为务”。达摩的传法方式，也是“随其所止”，弟子名者仅道育、慧可等，寥寥可数。最后，“不测所终”。^[2]

道宣对于达摩很推崇，说他“志存大乘，冥心虚寂，通微彻数，定学高之”。^[3]按理说，他的“大乘壁观”禅定法，应该能够顺畅地推行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因为“于时合国盛弘讲授”，^[4]达摩的禅法同时尚格格不入，以至到处受到讥谤、排挤以至打击。^[5]当时讲经和注疏事业的繁荣，是随佛教经典的名相化而来的。我国初期的译经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，所用词语也往往借用本土老、庄及玄学之所有。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佛

[1]《祖堂集》卷第二“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佛藏要集选刊》第14册景印高丽本，第85页上，1994年印行本。

[2] 案：后来的灯录，谓达摩乃南天竺国王第三子，得如来心传而来东土；见梁武帝，机缘不契，一苇渡江；栖止少林，面壁九年；死葬熊耳山，昭明太子作文遥祭，梁武帝为之立碑；后东魏使人宋云尚见其只履西归。参见《传法宝纪》、《楞伽师资记》、《祖堂集》、《景德传灯录》等书。学者对此多存疑问，讨论甚夥。

[3] 唐·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第十六《齐邨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五》：“神慧疏朗，闻皆晓悟。志存大乘，冥心虚寂。通微彻数，定学高之。”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551页中。

[4] 案：关于当时盛弘讲授的情况，慧皎《高僧传》“义解”篇有着集中的反映。如说慧球“讲集相继，学侣成群”（《高僧传》卷第八“义解五”《慧球传》）。宝亮“讲《大涅槃》凡八十四遍，《成实论》十四遍，《胜鬘》四十二遍，《维摩》二十遍”，“撰《涅槃义疏》十余万言”。（《高僧传》卷第八“义解五”《宝亮传》）分别见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381页上和第381页中。

[5] 案：《历代法宝记》“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”载，达摩泛海东来后，曾遭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六度毒害。“语惠可：‘我缘此毒，汝亦不免此难。至第六代传法者，命如悬丝。’言毕，遂因毒而终。”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1页上。

教三藏逐渐被系统地介绍过来，遂产生强烈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要求。^[1] 国盛弘讲授的风气，虽说不利达摩禅法的传播，却为下开隋唐时期的各类佛教门派，建立了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达摩初履中土之不得意，可能还有其禅法上的原由。上文已经论及，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，而达摩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。我们读《高僧传》“习禅”篇各传，所见都是其人的神通如何广大，这既有中国六朝志怪文化的影响，也许还反映了当时行者习禅的旨趣。慧皎也说：“禅用为显，属在神通。”将禅定与仙术相属。^[2] 而达摩的“二入四行”，却是要趣入菩提道，销融无始以来的种种积习，以彻见自性本源为目的。在境界、方法以至目的上，都与时俗大异其趣。燕雀不知鸿鹄之志，达摩禅不为时人所接受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蹇境遇，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所亲受。禅宗在初创期间，命运唯艰，屡遭打击，居无定所，门庭寂寥。《历代法宝记》谓慧可“后佯狂，于四衢城市说法，人众甚多”，竟遭诬告，为城安县县令翟冲侃杀害。^[3] 《续高僧传》则说僧璨“后以天平之初，北就新邳，盛开秘苑。滞文之徒，是非纷举”，^[4] 只得隐居遁世。在这种境况下，他们守成已是不易；求其发展达摩的禅法，乃不能也，非不为也。这一时期，禅宗尚未与念佛发生关系。但是，就在达摩禅郁而不彰之时，净土信仰却渐入人心。且不论在此之前弘扬弥勒净土信仰的道安、弘扬阿弥陀净土信仰的庐山慧远这些佛教领袖，就是与达摩同时代的净土宗重要人物昙鸾，与达摩相比，二者的际遇也是判若云泥。

昙鸾（476～542），据唐·道宣《续高僧传》记载，为雁门人（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）。出家后广学经论，尤擅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大智度论》及佛性学说。他在为北凉·昙无讖译《大

[1] 案：《高僧传》卷第五“义解二”《释僧先传》：“因共披文属思，新悟尤多。安曰：‘先旧格义，于理多违。’先曰：‘且当分折逍遥，何容是非先达。’安曰：‘弘赞理教，宜令允惬。法鼓竞鸣，何先后！’”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355页上。

[2] 《高僧传》卷第十一“习禅”篇之“论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400页下。

[3] 《历代法宝记》“北齐朝第二祖惠可禅师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1页中。

[4] 《续高僧传》卷第十六“齐邳中释僧可传六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552页上。

集经》作注时得气疾，因而感到生命短促，希望找到长生不死的方法。他听说江南道士陶弘景博通仙术，名重海内，便于梁大通年间（527~528）往江南寻访。起初县鸾被人怀疑是北朝的奸细，经澄清后，被引见给梁武帝。梁武帝不仅亲自“降阶礼接”，^[1]甚至称县鸾为“肉身菩萨”，“恒向北遥礼”。^[2]后来，县鸾因菩提留支授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而放弃陶弘景所传仙术，专志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修学与弘传，“自行化他郡，流靡弘广，魏主重之，号为神鸾焉。下敕令住并州大寺，晚复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。时往介山之阴，聚徒蒸业，今号鸾公岩是也。”^[3]县鸾所建立的“二道二力说”、“往生成佛说”、“持名念佛说”等理论，为净土宗的广泛弘传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而禅宗所初期遭遇的窘迫境况，直至道信、弘忍的时代，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

东山法门

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是禅宗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，他们所开创的“东山法门”，^[4]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，一个里程碑，标志禅宗自此真正意义的成立。

道信（580~651），俗姓司马，河内人，^[5]因其父任永宁令，全家迁徙至蕲州。^[6]七岁出家。僧璨隐舒州皖公山时，往赴受法，依学十载。隋

[1] 唐·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六“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释县鸾传三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470页上至中。案：“鸾”也写作“鸾”。

[2] 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达传七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553页中。

[3] 唐·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六《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释县鸾传三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470页下。

[4] 《传法宝纪》道信、弘忍传题均作“双峰山东山寺”。见杨曾文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印行）附编一，第164页。案：下文引《传法宝纪》均为此本（《大正藏》本残而不全，故不用）。

[5] 《历代法宝记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1页下。

[6] 《湖北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九，《人物志》四十七《仙释传》：“道信，姓司马氏。世居河内，父为永宁令，徙于蕲州。（原注：按，永宁，今广济。唐武德四年分置，开皇时未有此县，自后书之。）”（苏晋仁、萧鍊子选辑《历代释道人物志》，巴蜀书社1998年6月印行本）

炀帝大业间，贼围吉州城七十余日，教全城合声同念“般若”。后来留止于庐山大林寺，达十年之久。^[1]唐高祖武德七年（624），蕲州道俗请度江北，因见黄梅双峰山^[2]“有好泉石”，遂造寺终止。^[3]“大作佛事，广开法门，接引群品，四方龙像，尽受归依。”^[4]唐贞观十七年（643），太宗三次敕使，礼请入京，均辞老不赴。^[5]永徽二年闰九月示寂，春秋七十二。

道信的历史功绩，首先是北迁黄梅，辟宇授徒，对于禅宗的传承方式作了大胆的革新。此前的禅宗宗师，都是采用头陀行的个人静修方式。史载达摩及其门人“行无辙迹，动无彰记。法匠潜运，学徒默修”。^[6]其门下都承其遗风，过着“住无再宿”、“常行乞食”^[7]的苦行僧生活。这种独来独往、来去随缘的云水生涯，既不可能大事弘法，也不方便摄受学人。道信北渡黄梅，建立起了禅宗的殿堂，不再“或岩居穴处，或寄律寺”，^[8]而是“择地开居，营宇玄像”。^[9]存没有迹，旌榜有闻”。^[10]公开、普遍地传禅授法，“诸州学道，无远不至”。^[11]到他示寂时，山中达五百余人。^[12]弘忍得其传承后，在东山立寺，影响更大，“道俗投学者，天下十八九。自东夏禅匠传化，乃莫之过”。^[13]以致弘忍临终时不无骄傲地

[1]《续高僧传》卷第二十一《唐蕲州双峰山释道信传十九》：“既见平定，欲往衡岳。路次江湖，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。虽经贼盗，又经十年。”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606页中。

[2] 案：双峰山，又名破额山或破头山，在黄梅县西，故称西山；后五祖建道场于冯茂山，山在黄梅县东，又名东山。

[3]《续高僧传》卷第二十一《唐蕲州双峰山释道信传十九》：“蕲州道俗请度江北，黄梅县众造寺。依然山行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，即住终志。”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606页中。《传法宝纪》、《历代法宝记》所载均同。

[4]《历代法宝记》“唐朝第四祖信禅师”。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1页下至第182页上。

[5] 案：事见《历代法宝记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1页下。此事《续高僧传》和《传法宝纪》均不载。

[6]《传法宝纪》“论”，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附编一，第169页。

[7]《续高僧传》卷第十六《齐郢中释僧可传六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552页下。

[8] 元·德辉重编《百丈清规》“住持章”第五。《大正藏》，第48册，第1119页上。

[9] 案：“玄像”，似为“立像”之误。

[10]《传法宝纪》“论”，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附编一，第169页。

[11]《续高僧传》卷第二十一《唐蕲州双峰山释道信传十九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0册，第606页中。

[12] 同上。

[13]《传法宝纪》“释弘忍”，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附编一，第167页。

说：“吾一生教人无数。”^[1]“东山法门”经过两代人的开启和传播，黄梅一时成为了全国禅教的中心。禅宗后来常说：“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”禅宗丛林的创建，似可提早到道信和弘忍的时代。

其次，道信对于禅宗思想和人道方便上，也作出了有益的建设和改革。唐·净觉《楞伽师资记》“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禅师”说：

其信禅师，再敞禅门。宇内流布有《菩萨戒法》一本，及制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，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，要依《楞伽经》“诸佛心第一”，又依《文殊说般若经》‘一行三昧’，即念佛心是佛，妄念是凡夫。^[2]

有关《菩萨戒法》的内容，《楞伽师资记》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。联系道信倡导的“一行三昧”禅法，其戒法当属“安心”和“见性”的方便法门，旨在制止修禅过程中妄念的泛起。戒与禅相辅以行，正是“东山法门”的门风之一。菩萨戒属于大乘菩萨所受持的戒律，与小乘声闻所受持的戒律有所不同。达摩以下二传、三传，所修都是头陀行。十二头陀行本属声闻乘律仪，但是达摩从一开始提出“二入四行”时，就已经为其注入大乘思想。尤其是第四“称法行”，^[3]强调在“三轮体空”中修行大乘菩萨的六度，自利利他，“庄严菩提之道”，在根本上和菩萨戒的精神是一致的。可见达摩所传禅法，从一开始就为禅宗重视菩萨戒点燃了慧灯。道信开宇后的实际情形，已与十二头陀行不相融合，以菩萨戒法取代头陀行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又据史载，梁武帝、陈文帝和隋炀帝都曾受过菩萨戒，从者乃至数万人，足见其风气之盛。道信在禅宗的传承上，首倡菩萨戒法，也似存有时代风尚的影响。

[1] 《历代法宝记》“唐朝第五祖弘忍禅师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2页上。

[2] 《大正藏》，第85册，第1286页下。

[3] 案：《楞伽师资记》“第二：“第四称法行者：性净之理，因之为法。理此众相斯空，无染无著，无此无彼。经云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。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智若能信解此理，应当称法而行。法体无愆于身命，则行檀舍施，心无吝惜。达解三空，不倚著，但为去垢。摄众生，而无取相。此为自复地，亦能庄严菩提之道。檀度既尔，余五亦然。为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。”《大正藏》，第85册，第1285页中。

这种戒禅结合的门风，也为后来南能北秀所继承。神秀《大乘无生方便门》说：“菩萨戒是持心戒，以佛性为戒。性心瞥起，即违佛性，是破菩萨戒；护持心不起，即顺佛性，是菩萨戒。”^[1]惠能《坛经》曾引《菩萨戒经》说：“戒本源自性清净。”并发挥说：“见自性自净，自修自作自性法身，自行佛行，自作自成佛道。”^[2]不过惠能已改念佛为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受菩萨戒也改为受无相戒了。^[3]

道信还是将“一行三昧”引入禅宗的第一人，“一行三昧”也是东山法门的标志之一。据文献记载，神秀于大足元年（701）被召入东都，“随驾往来，二京教授，躬为帝师。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：‘所传之法，谁家宗旨？’答曰：‘禀蕲州东山法门。’问：‘依何典诰？’答曰：‘依《文殊说般若经》一行三昧。’则天曰：‘若论修道，更不过东山法门。’以秀是忍门人，便成口实也。”^[4]

道信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开章明义即说：“要依《楞伽经》‘诸佛心第一’，又依《文殊说般若经》‘一行三昧’，即念佛心是佛，妄念是凡夫。”取《楞伽经》印心，乃初祖以来的传承；而“一行三昧”的源流，则取自天台宗的智顗。我们知道，道信曾居止大林寺十年，庐山乃是天台、三论宗的重镇，而天台宗在当时的影响又如日中天，在这种历史和环境的熏陶下，受其影响也不为无因。智顗《摩诃止观》说：“《法华》云：‘又见佛子，修种种行，以求佛道。’行法众多，略言其四：一常坐，二常行，三半行半坐，四非行非坐。”^[5]藉此四种修法，即可正观实相，住于三昧。他在进一步阐述“常坐三昧”时说：

一常坐者。《文殊说》^[6]、《文殊问》^[7]两般若，名为一行三昧。今

[1] 《大正藏》，第85册，第1273页中。

[2] 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第20页。

[3] 同上，第5页。

[4] 《楞伽师资记》“第七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85册，第1290页上至中。

[5] 《摩诃止观》卷第二上，《大正藏》，第46册，第11页上。

[6] 即梁·曼陀罗仙译《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其经原文与下道信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所引大体相同。原文见《大正藏》，第8册，第731页上至中。

[7] 即梁·僧伽婆罗译《文殊师利问经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14册，第507页上。

初明方法，次明劝修。方法者，身论开遮，口论说默，意论止观。身开常坐，遮行住卧。或可处众，独则弥善。居一静室，或空闲地，离诸喧闹。安一绳床，傍无余座。九十日为一期。结跏正坐，项脊端直。不动不摇，不萎不倚。以坐自誓，胁不至床，况复尸卧，游戏住立。除经行食便利，随一佛方面，端坐正向。时刻相续，无须臾废。所开者专坐，所遮者勿犯。不欺佛，不负心，不诳众生。口说默者，若坐疲极，或疾病所困，或睡盖所覆，内外障侵夺正念，心不能遣却，当专称一佛名字，惭愧忏悔，以命自归，与称十方佛名功德正等。^[1]

道信在四种三昧里，只撷取了“一行三昧”亦即“长坐三昧”一种，而且在具体修法上，也不全同智顗所论。他在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里详细地论述道：

《文殊说般若经》云：“文殊师利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一行三昧？佛言：法界一相，系缘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入一行三昧，当先闻般若波罗蜜，如说修学，然后能一行三昧。如法界缘不退、不坏、不思议，无碍无相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入一行三昧，应处空闲，舍诸乱意，不取相貌，系心一佛，专称名字。随佛方所，端身正向。能于一佛念念相续，即是念中能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。何以故？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，皆乘一如，成最正觉。悉具无量功德、无量辩才。如是入一行三昧者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”夫身心方寸，举足下足，常在道场。施为举动，皆是菩提。《普贤观经》云：“一切业障海，皆从妄相生。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。”是名第一忏悔。并除三毒心、攀缘心、觉观心念佛，心心相续，忽然澄寂，更无所缘念。《大品经》云：“无所念者，是名念佛。”何等名无所念？即念佛心名无所念。离心无别有佛，离佛无别有心。念佛即是念心，求心即是求佛。所以者何？识无形，佛无相貌。若也知此道理，即是心常忆念佛，攀缘不起，则泯然无相，平等不二。入此位中。忆佛心谢，更不须微。即看此等心，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，亦名正法，亦名佛性，亦名诸法实性实际法，亦名

[1] 《摩诃止观》卷第二上，《大正藏》，第46册，第11页上至中。

净土，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，亦名涅槃界般若等。名虽无量，皆同一体，亦无能观所观之意。如是等心，要令清净，常现在前。一切诸缘，不能扰乱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。住是心中，诸结烦恼自然除灭。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，无量世界集一毛头端，于其本事如故，不相妨碍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有一卷经卷，在微尘中，见三千大千世界事。”略举安心，不可具尽。其中善巧，出自方寸。^[1]

拿道信与智顗的说法两相比较，可以发现：道信取《文殊说般若经》而舍《文殊问般若经》，把克期取证的九十日放宽到一年、三五年，以至更长。^[2]四祖身体力行，“昼夜常坐不卧，六十余年，胁不至席”。^[3]并且常常以此为教：“每劝门人曰：‘努力勤坐，坐为根本。能作^[4]三五年，得一口食塞饥疮，即闭门坐。莫读经，莫共人语。能如此者，久久堪用。如猕猴取栗子中肉吃，坐研取，此人难有。’”^[5]五祖弘忍在其门下，也是“昼则混迹驱给，夜则坐摄至晓，未尝懈怠，精至累年”。^[6]达摩本有

[1] 案：本文用敦煌二种写本互校，以伯本（P. 3436号，载《敦煌宝藏》第128册）为底本，校以斯本（S. 2054号，载《敦煌宝藏》第15册）。《大正藏》系过录斯本，然脱漏讹误不一。

[2] 案：《楞伽师资记》“第五”云：“或可一年，心更明净。或可三五年，心更明净。”《大正藏》，第85册，第1287页中。

[3] 《历代法宝记》“唐朝第四祖信禅师”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1册，第181页下。

[4] 案：这个“作”字，即指“坐”的行为。意谓能够如此这般地坐上三五年，就可打下习禅的基础，而后“久久堪用”。吕澂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第九讲谓：“道信住在双峰山的时间那样长，徒众那样多，在史传中却看不到有什么官僚豪门的支持，而是用自给自足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，这与当时居于城市依赖权贵的佛徒是不同的。这一点，自然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系。自南北朝以来，中间虽然经过隋代的统一，但至唐初，社会还是不很安定。唐初仍沿用前代的均田制，每成丁受田百亩（其中永业田二十亩、口分田八十亩）。但事实上，可耕地不够分配，因此法律上允许人们开荒。这样，一般民众可以借口出家，自己去找地耕种，同时还可避免赋役的负担。佛教也就藉此来号召门徒。道信在双峰山所提倡的自耕自给是当时经济状况允许的，也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。这事在关于他的传记（敦煌卷子《传法宝纪》）中也可以看到‘……教诫门人，努力勤坐为根本’。如何保证生活呢？‘能作三五年，得一口食疗饥疮，即闭门坐’。‘作’指劳作，主要指务农而言。肚子饿了是一种病，称为‘饥疮’，吃就可以治疗它。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‘闭门坐’。‘莫读经，莫共人语，能如此，久久堪用’。”（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卷五，第2754页。齐书社1991年7月印行本）今案：吕先生显然将文意理解错了。整段文字并未曾谈及农耕的事，突然地转移主旨，似非正常。而且，以当时的生产力，也不可能劳作三五年，就可以毕生衣食无忧。

[5] 《传法宝纪》“唐双峰山东山寺释道信”，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附编一，第166页。

[6] 《传法宝纪》“唐双峰山东山寺释弘忍”，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附编一，第167页。